

代理僭政：比较何以戴上认知王冠

要害不在于手段压倒目的，而在于代理物对认知对象的位置篡夺

胡志英 著 · SDE 学员 · 量化治理与认知体制 · 2026年7月27日

摘要 在认知负荷、制度压力与技术便利的催化下，认知的代理物——指标、名号、量化模型——从临时工具逐步篡夺认知对象自身的地位，使后续认识活动不再指向那个最初需要被认识的对象，而指向代理物本身。这不是任何单一行动者的阴谋，而是命名、道理、数字三重装置互相咬合的自我增强过程。本文以全球大学排名为贯穿案例，追踪它如何从新闻编辑室的临时创意沉降为全球高等教育治理的准宪法。

关键词：量化治理与认知体制

这一生成机制判断要求将自己的证伪条件内置在结构中，而不是寄托于一个外部的“对照实验”。代理僭政命题的可裁决性在于：你是否准确捕捉了那些让代理物得以篡位的发生条件与装置联动？如果对命名、道理、数字三重装置的微观分析显示，它们在实际历史中彼此独立运作，无法形成互为燃料的联动回路；或如果对排名抵制历史的追踪可以证明，排名体制的“弹性”并非来自装置联动的内部动态，而完全由外部政治力量单方面强制——那么代理僭政的生成机制模型就需要做重大修正。这一证伪策略的焦点不是“代理僭政是否造成伤害”，而是“代理僭政是否发生”：你能否追踪到代理物确实篡位了认知对象的那条轨迹？

为了将这一生成机制追问从抽象的论断撑开为对制度现实的分析，本文选择全球大学排名系统作为贯穿性的经验锚点。这不是一个任意的例子。在全球知识治理的诸多领域中，几乎没有第二个场域像高等教育排名这样，完整地展演了代理物如何从一项新闻编辑室里的临时创意，演化为全球大学竞相追逐的实体性目标，并在此过程中重新定义了“教育是什么”这个本应不断被重新追问的问题。解剖这个案例，不是为了提出一个“更好的排名体系”——那本身仍然在代理的圈内打转——而是为了拆解那台不断制造着比较霸权、并将一切认知拖入代理游戏的动态机制，并追问：在代理已经高度制度化的既成事实下，如何持续地让代理物感知到来自认知对象的反压——让数字、指标、名号始终处于可以被认知对象重新审问的不稳定性中？

本文将首先回溯代理何以大规模获得篡位条件的历史土壤，然后解剖其核心的三重装置——命名、道理、数字——及其相互咬合的动态，接着在与拟像、治理术、工具理性及量化修辞学等相邻概念的严肃对话中确立代理僭政的不可还原性，最后在回应关键反驳的基础上，探讨在代理矩阵内部维持生产性张力的可能性。

一、篡位的土壤：可比较性偏好的历史生成

代理物并非天然就是篡位者。在漫长的前现代社会里，认知的主要目标是与事物的秩序进行深度的、可长时间沉浸的接触——理解自然的节律、领受神的诫命、体悟经典的字句。在这一认知生态中，代理（例如地图、账簿、家谱）固然被使用，但它始终扮演着从属的、服务于对象的角色。地图只是通往土地的工具，一个人若终身只对着地图指认山河，而从未涉足那些山河，会被视为懂得符号而不懂得事情本身。

这种代理与对象之间相对稳定的从属关系，是在现代社会的一系列深层变迁中被大面积松动的。这松动本身，恰恰是代理僭政得以发生的历史前提。但要小心这里的措辞——“松动”一词已经暗含了一个预设：前现代的代理-对象关系是“稳固的”“正当的”，而现代的变化是“松动了正当秩序”。这是既成事实论最典型的叙事技巧：先确立一个规范的起点，再将偏离叙述为病理。生成机制的追问不预设规范的起点，它只追问：在什么条件、什么压力下，代理物开始从认知工具向认知对象滑移？

最关键的变动发生在认知需求的底层结构上。当社会组织的规模急剧扩大，行政管理的链条不断拉长，经济交换的速度持续提速，整个现代社会的决策结构开始承受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依据大幅超越个体直接经验边界的信息，做出能够公开辩护的、可横向比较的判断。一个中世纪的修道院院长可能需要花数年时间判断一块土地的价值，而一个现代大学教务长在资源分配会议上的发言时间只有几分钟，却必须给出关于几十个科系“绩效”的结论。这种规模与速度的双重挤压，使得一种特定的认知偏好——对可比较性的系统性偏好——开始从众多认知德性中脱颖而出。一种判断如果能被快速转化为一个数字，从而与另一个部门的数字并排陈列，它就显得比一段需要时间沉浸才能领会的质性描述更“负责任”，也更能抵御事后问责。

称这种偏好为“效率焦虑”是一种诊断性的命名——它暗示这是一种病态的、值得被治疗的紧张。但在生成机制的透镜下，我们不如先悬置这个命名，转而问一个更冷静的问题：这种对可比较性的偏好，究竟是在什么制度条件下被发生出来，并被确立为“理性”“负责任”的同义词的？那些身处其中的人——大学管理者、政府官员、学生家长——在他们的局部处境下感受到的并不是“焦虑”，而是“责任”：他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依据可得的、可辩护的信息，做出影响深远的决策。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认知体制中普遍存在的这种对

可比较性的系统性偏好，不是一种可以被轻易“治愈”的心理症状，而是特定制度条件下局部理性选择的宏观涌现。

不同的制度领域对这一偏好的喂养各有其逻辑。官僚体系需要可追责的决策依据；市场经济需要可比较的商品信息；大众民主需要可公开辩论的政策评估标准。这些领域各自独立地无意识累积着对可量化代理物的需求，但它们的认知后果却协同一致：它们共同给予那些能够“通约”世界的代理物——指标、分类、评分——以空前的合法性与实用性。从此，代理物不再是学者案头可有可无的辅助工具；它成了官僚、经理、投资人手中据以决策的首要依据。它在功能上获得了“第一公民”的身份，而在认知上，则悄然获得了为自己所代理的对象“代言”的资格。代理篡位的历史舞台，就此搭就。

大学排名的崛起，恰好嵌在这片土壤里。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首次推出“美国最佳大学”排名时，其动机是标准的新闻逻辑：回应大众消费者对“哪所大学更好”的朴素好奇，用一些可获取的公开数据排个序，增加杂志销量。彼时，没有一个参与者会宣称这个榜单是“教育质量的客观真理”。但当大学开始把排名用于招生宣传，当学生和家長以它作为择校的导航图，当董事会的问责需要简单有力的图表，排名——最初作为新闻产品的那个代理符号——就恰好踏进了这片已经准备好承接“可比较的、可排列的答案”的土壤。土壤一旦承接，代理物便开始从新闻性的“趣味参考”向制度性的“事实陈述”滑移。这种滑移并非由某次精心策划的权力运作所发动，而是由无数个个体遵循局部合理性逻辑的日常选择所合谋促成：每一方都在自己的局部处境下依据代理做出了“最优”的认知。而当千千万万这样的最优认知联结在一起时，那个最初只是顺手使用的代理，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推到了认知对象的位置上。

理解这片土壤，是理解后续一切装置运作的前提。命名、道理、数字三重装置之所以能够嵌合运转，不仅因为它们由这片土壤提供了持续的合法性水分，也因为装置之间的相互咬合本身产生着独立于土壤的驱动力——装置的联动一旦启动，就会在相当程度上自我维持，即便最初的土壤条件发生了改变。接下来的分析，便是沿着这层地基，去拆解代理僭政如何在三重装置的咬合中，将比较锻造成我们时代默认的认知语法，并追踪这一动态如何在抵制与调整的矛盾中持续地重新凝结。

二、三重装置：命名、道理、数字及其联动

代理僭政要完成从工具到对象的跃迁，不能仅凭认知的集体惯性，还必须依赖一套制度化、技术化的生产及其正当化机制。在全球大学排名的案例中，我们可以辨识出三台互相咬合的装置：命名的赋魅装置、道理的辩护装置、数字的物化装置。它们并非松散的平行关系，而是在一个互相输送能量的联动结构中，一步步将代理物推上认知的王座。

（一）命名：赋魅装置如何让代理物披上本质的外衣

每一次代理篡位，都首先在语言中为自己开辟疆土。一个标签被贴上的瞬间，无论它诞生时多么临时、多么功能导向，它已经开始不声不响地完成从“指标”到“本质”的滑移。全球大学排名中最具魔力的标签，莫过于“世界一流大学”这一命名。

这个命名并非简单的技术术语，它是一台高功率的赋魅装置。在语义的层面上，它暗自裹挟着十九世纪洪堡大学“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古典荣光，又负载着二十世纪末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对“卓越”的高端品牌想象。在“世界一流”这四个字的辐射下，多样、具体、常常充满内在张力的教育实践——一位教授花一个下午逐字批改学生的论文，一门实验课因为一次意外的实验失败而整个改写教学计划，一个学术共同体花了十年时间才孕育出一项足以改写教科书的基础发现——所有这些不可通约的经验材料，都被这个标签一笔罩住，并被等义地翻译为“在给定的指标体系下获得高分”。这就是命名赋魅的第一重动作：用一个携带着厚重文化声望的词语，将一套特定的量化操作包裹为不言自明的价值目标。

这里发生了一个反直觉的翻转，而这个翻转需要被仔细追踪。在排名体制的初期，“世界一流大学”这个标签是排名的结果：因为某所大学在榜单上名列前茅，所以它被媒体、公众、乃至大学自己称为“一流”。此时，排名是因，标签是果。但随着排名体制的制度化，这个因果关系在公共话语中悄然反转：人们不再先看排名再判断“一流”，而是先把某所大学默认为“一流大学”，然后期待它在排名中表现良好；如果它的排名下滑，人们会感到“名实不符”的困惑，甚至质疑排名的准确性，却极少质疑“一流”这个标签本身是否还有意义。命名一旦完成这场翻转，就不再是排名的附庸——它成了排名的前提。一所新晋大学想要被公认为“一流”，就必须先在排名中证明自己；而一所老牌大学想要维护“一流”的名号，同样必须在排名中持续投入。

要捕捉这个翻转的微观过程，可以对比不同时期政策文本和媒体话语中对“一流”一词的使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开始使用“世界一流大学”这一表述时，其语境仍然相对具体：它通常与若干所公认的顶尖大学的名字并列出现，作为一种理想型的对标。但到了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随着“双一流”政策的全面铺开，“一流”已经脱离了与任何具体大学对标关系，变成了一个独立的政策分类标签——大学被直接划分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与“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前者获得巨大的资源倾斜。此时，“一流”已经不再是一种事后描述，而是一种事先身份：它是一个需要被“建设”的目标，而建设成效的核心证据，就是各项国际排名中的位置上升。“一流”从排名的结果变成了排名的前提，又从排名的前提变成了资源分配的依据。这个翻转一旦完成，排名就不再是“测量一流”的工具，而是“定义一流”的装置。

然而，如果“世界一流大学”仅仅停留在少数精英话语的流通中，它的赋魅效应将是局部而脆弱的。这就要说到赋魅装置的另一个关键组件：制度性的日常流通机制。一个代理标签要获得广泛的接受，仅仅靠一个惊天动地的定义是不够的，它需要被持续地、重复地、渗

透性地编织进大学管理者、政府官员、媒体与公众之间最普通的日常对话里。在大学校长的年度演讲、政府的战略报告、媒体的高考特刊、社交网络上的“名校鄙视链”中，“一流”这个标签早已脱离了它最初的语境，变成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前反思的分析框架。人们不再讨论“什么才算一流的教育”，而是直接去查看某个榜单上“一流大学”的名单。此时，标签已经不等于某个排名，但排名却成了标签最直观、最可公开引用的肉身。这个过程可以借用组织社会学中一个经典分析来参照：当某个制度性标签被足够多的组织公开采纳为合法性的标识物之后，它就获得了一种“理所当然”的力量——即便那些最初质疑它的组织，也常常因为担心显得不合群而最终采纳同样的语言（DiMaggio & Powell, 1983）。[1] 这种基于模仿的制度扩散，不靠自上而下的压制，而靠横向的、为了获得合法性而主动进行的趋同，恰恰是命名赋魅最隐蔽也最不可逆的扩散机制。

更深层地看，命名装置在赋魅的同时，也在执行一项隐蔽的认知裁撤。当一个文明把“世界一流”这种可比较的标签当作衡量大学的最权威尺度时，它同时就把那些不以标签分类为核心的认知传统——从师徒制中体悟一门手艺的默会知识，到漫长沉思中产生的与经典的精神共鸣——打入了“无法量度”“主观”“非科学”的认知边缘。代理物（“排名”及其命名）被立为正统，而那些拒绝或无法被这个代理物代理的认知方式，则被认为在主流认知体制中不值得占用正式的注意力。命名在此展现了它最不动声色却最具结构性暴力的一面：不是扼杀，而是忽视——将它者的声音排除在“什么算教育质量”这个问题的可讨论范围之外。

（二）道理：辩护装置如何编织代理与真实的等同叙事

命名给了代理物光环，但光环还需要一套“客观必然”的论证来固着，使它看上去不是任意的建构，而是理性选择的唯一归宿。全球大学排名的道理装置，由分布在若干学科中的理论片段组装而成。这些片段各自独立地运作，却同构性地论证了同一项命题：排名所指代的，就是真实的质量；使用排名进行选择与治理，是唯一合乎理性的路径。

在大学排名的早期辩护中，一组反复出现的叙事来自进化心理学的通俗版本。在《纽约时报》的教育专栏、TED演讲以及管理类畅销书中，人们可以反复读到这样的论断：在漫长的人类演化史中，有能力比较不同环境、不同猎物的个体，存活与繁衍的概率更高；因此，比较能力是自然选择烙在我们心智结构中的深刻偏好，我们不仅擅长比较，而且应当信赖比较的产物。[2] 这组叙事并不出现在学术期刊的前沿争论中，却凭借着通俗媒体庞大的传播网络，为排名披上了一层半生物学、半常识的合法性外衣。它的力量不在于论证的严谨，而在于它把排名这种具体的、可争议的制度实践，悄悄地等同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比较本能”的自然延伸，从而将对排名的质疑转换为对“理性”与“常识”本身的质疑。

另一组更为精密的辩护叙事则来自经济学关于信息不对称的经典研究。[3] 这组论证的要点是：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种高度复杂的、外行人难以直接判断的体验性商品，学生、家长、政府在没有长期深入体验的情况下，面临巨大的信息劣势。大学排名，哪怕存在诸多技术缺陷与价值偏见，仍然能够系统地提供一些可比较的信号，从而降低搜寻成本、提升匹配效率。根据这一逻辑，问题不在于排名是否完美，而在于“有没有排名”相比“完全没有排名”是否能带来信息效率的净增益。这套叙事之所以强韧，是因为它并不宣称代理物是完美的反映，而只宣称代理物是不可或缺的决策工具。这样，对排名指标的任何技术批评，都可以被吸收进“那就迭代出更好的指标”的建设性改良议程之中，而从不触及那个根本性的质疑：是否有些认识对象，从一开始就不应当主要通过横向比较的代理物流通？

更值得警惕的是，道理装置并不只是被动地“辩护”，它还有一套主动的认知驯化技巧——一种将反对“翻译”为有待升级的赞同的存在论收编机制。这个过程并非笔者的理论推演，它在具体的政策讨论中反复出现，有据可查。英国的研究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REF）在从先前的研究评估实践（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演变而来的过程中，人文学者曾反复提出一项核心异议：人文研究的价值——对经典的重新激活、对思想传统的深度阐释、对当代文化的批判性介入——具有不可量化的维度，不应被简化为科研成果的“产出单元”计数。这一异议在2000年代后期的公开咨询中获得了相当广泛的表达。然而，当REF的最终设计框架出台时，这项异议并未被驳回，而是被重新表述为：人文学科需要“更丰富、更精细的影响力案例研究”（impact case studies）来展示其社会价值。影响力案例研究正是这样一种装置：它不否认人文价值的“独特性”，而是将这种独特性本身转化为一种需要被书写、被提交、被专家组评分的新指标。反对者最初的主张——“有些价值与比较无关”——在进入政策协商的瞬间，被转化为“我们可以设计更好的比较方式来捕捉这些价值”。[4] 这就是道理装置的闭环力量：它不仅把赞成变成赞同，也把反对变成了有待升级的赞同；它不仅说服你接受排名，还说服你参与建设一个“更公平”“更全面”的排名——而你一旦参与建设，你就已经在行为上接受了“教育质量需要通过代理物流通”这一前提。

（三）数字：物化装置如何让代理物变得不可抗拒

命名赋予代理物以光环，道理赋予代理物以必然性，而数字，则赋予代理物以沉重、坚硬、不可抗拒的物质性力量。如果说命名与道理尚且停留在话语的层面，数字物化装置则直接作用于决策者的桌面、学者的履历、政府的拨款算法，将代理物凝固为一种可以触碰、可以排序、可以写进合同里追责的实体。

以研究评价中最具统治力的代理指标之一——“领域加权引用影响力”（FWCI）——为例，可以清晰观察数字物化装置的微观作业。FWCI的计算逻辑并不复杂：将一所大学发表的某篇论文的被引次数，除以全球同一学科领域、同一年份所有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得出一个比值。如果FWCI等于1.5，陈述句就是“这所大学的研究质量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50%”。整个复杂的认知操作——一篇论文从构思、实验、写作、同行评审到发表、被阅读、被引用，跨越数年、涉及数百个主体的复杂链条——在这句话中被压缩进单个数字与单个百

分比。

这个数字一经生成便脱离了一切具体的学术脉络，获得了三重暴力性的权力。第一，可携带。一篇被引用100次的文章，可能是一篇开创性的理论杰作，也可能是一篇因数据造假而引发大量反驳性引用的反面教材；一篇被引用10次的文章，可能是一门冷门学科的基石之作，也可能毫无价值。但FWCI的蒸馏器将所有这些质性的差别蒸发干净，只留下一个无背景、无气味、无重量的数字。从此，它可以被携带到任何决策场域——校长的PPT、政府的审计数据库、学生的择校表格——像一个完全中立的事实那样说话。

第二，可排名。1.5和1.4之间那0.1的差异，自动产生一个高下次序。这个次序是如此“客观”，以至于它不需要任何关于“什么算是好的研究”的价值观辩论。一位大学管理者可以直接宣称：“我们的FWCI更高，所以我们的研究质量更优。”这句话的语法——因为数字A > 数字B，所以实体A > 实体B——已经深深嵌入我们时代的认知惯习，使得任何替代性判断（例如“他们的研究更具颠覆性、更有可能在十年后改写整个领域”）都显得像是无据的、软弱的主观表态。

第三，可追责。数字一旦被设定为关键绩效指标，它便开始对每一位学者施加持续的、匿名化的压力。每一次发表，其引用数据都会被追踪、汇总，并构成年终考评、职称晋升的正式论据。学者开始下意识地调整研究行为：哪个选题更容易被高引期刊接受？哪家出版社的引用网络更广？在机构的激励框架之下，个体学者成为代理的生产者，同时又成为代理的服膺者。代理僭政在此完成了它最深层的渗透：我们不再是数字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数字的主动供养者。我们生产它，依赖它，然后让它来评价自己。

（四）三者的互相咬合：以US News排名的生成机制为例

如果这三重装置各说各话，代理僭政的制度化将是零散且脆弱无力的。它们的真正力量，在于它们构成了一个前馈与反馈交错循环的联动结构。这里的联动，不是一种逻辑上相互定义的静态系统，而是一个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一个装置的产物不断成为另一装置的燃料的动态咬合。我们也因此不能用“系统如何工作”的静态语汇来描述它，而必须去看它如何从特定行动者的一系列局部选择中一步步生长出来。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的演化史，为这种联动提供了一个微观的生成机制肖像。1983年，这份新闻杂志首次发布大学排名时，其方法论简陋得几乎稚气：编辑们根据一些容易获得的公开数据和自己的主观判断，将几百所大学硬塞进一个等次表中。命名在当时是低调的——它只是一份“美国最佳大学”（America's Best Colleges）列表，其封面文案的语气更接近消费者指南而非真理宣示。然而，一旦这个名单被杂志的庞大发行量推送进家庭与学校的日常视野，命名的赋魅就开始运转：媒体修辞、市场宣传、校友之间的意见交换，渐渐将“在US News的榜单上名列前茅”与“这是一所顶尖大学”划上等号。我们可以从同期媒体话语的微妙变化中捕捉这个赋魅过程。1980年代中期，《纽约时报》的教育报道在提及US News排名时，常用的限定语是“根据一项有争议的新排名”或“这份杂志声称”。而到了1990年代中期，同一家报纸在报道大学录取新闻时，开始直接使用“一所排名前二十的大学”这样的定冠表述，不再附加任何方法论存疑的说明。[5] 命名在最初的十多年间，主要由流通频率——而非学术权威——完成了从“趣味参考”到“地位象征”的赋魅滑移。

道理装置的嵌入略晚一步，但却格外有力。随着排名的影响力增大，大学开始公开批评它的方法论——例如过分强调新生录取率、忽略了教育过程的实际质量。这种批评催生了一种新型的学术产业：研究排名方法论的教育学家和统计学家开始出版报告，既指出缺陷，也提出改进建议。道理装置便在这样一种“批评—改进”的循环中被锻造出来。学界不是全盘拒绝排名，而是试图用更“科学”的道理去驯化它——这正是代理僭政最喜欢的养料，因为它把一切反对都翻译成了“等待被升级的版本”。到了1990年代，管理主义的高等教育理论援引组织效能、战略规划等概念，进一步为排名提供了一套积极、现代、“支持卓越”的叙事依据，将排名的使用建构为“负责任的管理者”的标记。

数字物化装置的大规模介入则与信息技术的扩展同步。早期排名依赖各大学志愿填报的纸质数据，更新慢、成本高。而当联邦政府开始系统性地收集高等教育数据，当学术出版数据库（如Web of Science、Scopus）提供了可编程检索的引用数据，数字生产的成本和速度都发生了质变。排名机构从被动等待数据，转向主动抓取数据并建立复杂的加权算法。与此同时，大学的行政系统也主动地调整自身以适应这些算法：设置了专门的排名应对办公室，投资于可以提高排名指标的工作（例如用小班教学降低师生比），并将校长的年度绩效与排名涨跌挂钩。数字装置由此彻底物质化：它不再是纸面上的符号，而是直接嵌入机构的资源分配、人员考核与建筑规划之中。

在这个演化弧线中，命名、道理、数字的功能是无法分离的。命名创造了一个值得竞夺的社会价值目标（“一流”），这一目标为道理提供了必须被论证的“当然前提”；道理生产了关于“为什么排名有效”的正当化叙事，这一叙事又召唤更多、更“精确”的数据来证实自己；数字则提供一个可执行的操作平台，将名与理的共识落实为可测量、可奖罚的日常实践，并将这些实践的结果再次输送给命名——某大学因为高排名而获得更多捐助，这在公众眼中进一步证实了它“一流”的名号。于是，一整个由新闻编辑室的不经意之举所启发的认知体制，就在三重装置的互相咬合中，从“一份杂志的榜单”沉降为全球高等教育治理的准宪法。值得强调的是，这个咬合过程并不是某个中央策划者设计的；每一重装置都是在自己的局部领域里，回应当下的需求与批评，却在不经意间为另一重装置输送了燃料。

三、自我增强的动态：常态运转与危机后的重新凝结

当命名、道理、数字三重装置在日常的互相加固之中稳定下来，代理僭政便发展出一种自我增强的动态：它越是运转，就越显得理所

当然；越是理所当然，就越驱使更多的行动者加入它的再生产。但这种自我增强并非一帆风顺的线性进程。外部抵制与合法性危机不时发生，而代理僭政的真正韧性，恰恰展现在它如何从危机中重新凝结——不是通过“修补自己”回到原状，而是通过吸收抵制的能量，在矛盾中结算出新的显现态，并让这一新显现态回写各方后续的行为路径与制度土壤。

常态下的增强轨道。 在一个排名体制已经固化的环境中，各方的理性选择会不约而同地喂养这个体制。准备申请的学生发现，心仪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在用排名筛选简历，于是更仔细地研究排名，更坚决地按照排名选择学校。大学管理者观察到，排名下滑的年份申请人数明显下降，于是在院系预算中加大对可提升排名指标的投入——哪怕这意味着压缩那些对排名无直接贡献但对教育本身至关重要的项目（例如自由选课咨询、心理健康支持、社区服务学习）。学者们注意到，在高排名机构就职更容易通过课题评审，于是在职业流动中有意识地往排名箭头所指的方向迁移。每一方在自己的局部处境下做出的这些决策，都是可以共情的“理性”选择。然而，数以万计这样的局部理性选择聚合在一起，便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难以挣脱的集体行为闭环：代理物被每一个行动者当作参考点，而每一个行动者的行为又进一步巩固了代理物作为参考点的地位。这个增强回路不需要一个中央策划者，它只需要每一个行动者在一个已经代理化的认知环境里，做出对自己而言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选择。

危机之后的重新凝结：2019–2023年抵制事件的完整循环。 然而，代理僭政的动态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在特定的历史节点上，被长期压制的“不适合代理”的认知需求会积聚起抗议的能量，导致代理体制面临公开的合法性危机。2019年至2023年间，一场从美国顶尖高校掀起的抵制浪潮，为这种危机的动力与后果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完整的生成机制切片。

这场抵制的第一波始于2019年，当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顶尖学府公开批评排名方法论，尤其是其中选择性指标（录取率）激励大学采取更具排斥性的招生策略。[6] 随后新冠疫情打断了这波抵制的势头。真正的引爆点出现在2022年：先是哥伦比亚大学一名数学教授发表长篇分析，指控本校向US News提交的本科排名数据存在系统性夸大；[7] 接着，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法学院几乎同时宣布退出US News法学院排名，理由是排名方法论“惩罚了那些致力于为低收入学生打开大门的法学院”。“我们与US News的沟通未能促成实质性的方法论改变，”哈佛法学院院长在声明中写道。[8] 短短数月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等数十所顶尖法学院相继宣布退出。到2023年初，抵制行动蔓延至医学院（哈佛、斯坦福、哥伦比亚等）和本科学院——科罗拉多学院、罗德岛设计学院等本科学院也公开宣布不再向排名提交数据。US News随即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当排名中那些最“一流”的成员集体退出，排名的权威还剩下什么？

这正是命名、道理、数字三重装置被矛盾逼着重新凝结的时刻。抵制者提出的核心异议是：排名方法论通过过分强调录取难度与声誉调查，系统地惩罚了那些致力于教育公平的机构。这不是对排名细节的技术批评，而是对排名所定义的“好大学”标准本身的价值挑战——相当于在说：你所说的“一流”，恰恰与我们认为的卓越背道而驰。

排名机构的回应，如果被仅仅描述为“自我修补”，就会错失生成机制最关键的动态。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更为复杂：在抵制大学退出、媒体广泛报道、公众讨论升温的多重压力下，旧的均衡破裂了——排名不能再以原有形态继续运作，否则将面临“最好的大学都不在里面”的合法性真空。在这种压力下，一种新的显现态从矛盾的结算中浮现：US News在2023–2024年的方法论修订中，大幅调整了指标权重体系。它移除了校友捐赠率、班级排名、入学新生中高中前10%比例等受长期批评的指标，并将衡量社会流动性的第一代大学生毕业率等指标的权重提高。新的算法产出了一份新的榜单：一些此前排名中等的公立大学，因为其低收入学生毕业率表现优异而显著上升；一些传统的精英私立大学的位置则相对下降。

这就是矛盾结算出的新S：一个“对社会流动性更友好”的排名版本，即“进步版排名”。但这绝不是故事的结局。生成机制追问的下一笔——也是最容易被漏掉的一笔——是：这个新的S如何回写了各方后续的行为路径（D）与制度土壤（E）？

回写的第一层发生在大学的行为调整上。在新算法下，“提高排名”的优化策略发生了可观察的转移。一些大学开始更积极地扩大佩尔助学金获得者的招生比例，设立专门的第一代大学生支持项目——这些行为在旧算法下几乎不会产生排名回报，在新算法下则直接转化为排名优势。这是正向回写：抵制运动的部分价值诉求，确实被编码进了新的制度激励之中。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策略性的适应性行为：一些大学开始重新分类哪些学生算作“第一代”，或在高年级阶段加强对低收入学生的学业托举以确保毕业率——这些新策略就像旧算法下“用小班教学降低师生比”一样，本质上是将代理指标作为优化目标的新一轮游戏。

回写的第二层——也是更深的一层——发生在制度土壤（E）的重构上。“进步版排名”的诞生，在公共话语中产生了一个微妙但重要的后果：它加强了排名本身的合法性。抵制运动的最初诉求——排名不应该成为定义“好大学”的权威——在“进步版排名”的叙事中被悄悄替换。媒体讨论的重心从“排名是否存在”转向了“新排名是否更公平”。抵制者的退出虽然造成了短期冲击，但在新算法出炉后，部分大学（包括一些曾宣布退出的法学院）恢复了与US News的数据合作，理由是新方法“回应了我们的关切”。[9] 排名的权威在经历了短暂晃动之后，以一种更新、更“进步”的面貌重新站稳了脚跟。这就是代理僭政的韧性所在：它不怕被批评——只要批评被吸收为算法的升级，它就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因为展示了“回应社会关切”的能力而获得了新的合法性。

但这里必须立刻加上一个关键的限定：这个回写并不是完美的闭环。抵制运动的行为遗产并没有被完全收编。“去排名化”运动在部分院校的招生宣传中留下了持久的痕迹：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在官方网站上弱化排名展示，转而强调“使命驱动”的叙事。一些大学联盟和高等教育协会启动了替代性信息共享平台的实验——虽然规模小、影响力有限，但它们的存在表明，新的制度缝隙确实被打开了。代理

僭政的“弹性”不是密不透风的修复，而是在持续的矛盾中重新凝结——每一次凝结都改变了代理矩阵的内部构成，也为下一轮抵制留下了不同的起点。下一轮矛盾的种子，就埋在这一轮的结算之中。

至此，我们可以从US News案例中提炼出代理僭政自我增强动态的生成机制逻辑：常态下，每一方遵循局部理性的选择共同喂养代理体制的增强回路；危机中，矛盾积聚到旧均衡无法维持，逼出新的显现态（新算法、新指标）；新显现态一经稳定，便回写大学的行为路径与制度土壤，或正向（编码了部分价值诉求），或反向（开启了新一轮优化游戏）；每一次重新凝结都在回应矛盾的同时制造着新的矛盾，为下一轮危机埋下伏笔。

四、不可还原性论证：代理僭政与相邻概念的严格勘界

一个分析概念要成立，不能仅靠描述经验现象，还必须证明它不具有任何相邻概念的可还原性——也就是说，它所捕捉的认知动态，不能被已有的、被充分讨论的概念所完全吸纳。本节将代理僭政与四个最强劲的首选概念——拟像、治理术、工具理性、量化修辞与指标反应性——逐一进行严格勘界，在承认重叠交叉的前提下，指明代理僭政在每一个对话者面前的那条真正的分离线。

（一）与拟像的分离：代理物篡位，原件未曾蒸发

在所有相邻概念中，鲍德里亚的“拟像”可能是最容易被拿来与代理僭政做比较的概念。鲍德里亚论证了这样一个过程：符号从“反映基本现实”的第一阶段，经由“遮蔽和歪曲基本现实”、“遮蔽基本现实的缺席”等中间阶段，最终抵达“与任何现实都没有关系”的纯粹拟像——一个没有原件的拷贝，一种自我指涉的符号世界（Baudrillard, 1981）。

代理僭政与拟像共享一个观察起点：符号（或代理物）在特定条件下会脱离原初的指涉关系，开始在一个自足的系统内自我繁殖。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大学排名的运作确实呈现出某些拟像化的症状：排名数据之间的相互引用（一所大学因排名高而获得更多引用、因引用高而排名更高），排名指标之间的循环论证（用声誉调查来测量声誉，用排名来影响声誉调查的受访者认知）——这些动态确实有拟像的韵味。

但代理僭政与拟像在一个关键点上真正分离：僭政预设了一个真实的认知对象的持续存在并持续施加着压力。教育本身——作为发生在具体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师生对话中的复杂实践——并没有在排名的光芒下蒸发。它仍然在那里，持续地生产着无法被排名捕获的经验：一个学生在某门课上经历了认知框架的彻底重组，一位教授在办公时间的交谈中改变了某个学生对整个学科的理解，一个研究团队在无数次失败后获得的那个微小但真实的洞察。这些经验是真实的、持续的、有因果效力的——它们影响着学生的成长、教授的职业满意度、知识的生产。排名篡夺了“教育质量”的认知位置，但它并没有让真实的教育实践消失。正因为真实的教育实践持续存在并持续施加着压力，僭政才是一个动态的、充满矛盾的、随时可能被重新打开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符号已经彻底吞没原件的最终状态。

拟像的逻辑走到终点，原件已经不再作为原件起作用——它是一个被宣告死亡的存在。而代理僭政的逻辑恰恰相反：代理物之所以是“篡位者”，正因为它坐在一个仍然活着的、仍然能够发话的认知对象的位子上。正是原件的持续存在——学生仍会在课堂上经历顿悟与困惑，教师仍会在深夜为一道命题的讲法而反复斟酌——使得代理与真实之间的张力无法被彻底消解。代理僭政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持续被争夺的战场：每一次排名危机、每一次学者的联合抵制、每一次大学宣称“我们的价值不能被排名捕获”，都是那个被篡位的真实在代理矩阵的缝隙中发出声音的瞬间。因此，代理僭政比拟像更“保守”，也更“乐观”：它不宣称真实已经死亡，它只指认真实被篡位了——而篡位意味着复位是可能的，至少，维持篡位状态需要持续的能量投入。

（二）与治理术的分离：认知内部的篡位，而非权力的知识操作

福柯的“治理术”概念是另一个必须严肃对待的对话者。治理术分析揭示了现代国家如何通过统计学、人口学、公共卫生调查等知识形式，将人口建构为可管理、可调控的对象，并通过一整套“真相政体”将个体塑造为自我规训的主体（Foucault, 1978, 2004）。

从表面上看，代理僭政的三重装置分析——命名、道理、数字——与福柯的知识/权力分析共享着对“客观知识”的去自然化冲动。大学排名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确实参与了对高等教育领域的治理：政府通过排名来分配资源，公众通过排名来监督大学，大学自身通过排名来进行自我管理，学者通过排名指标来规训自己的研究行为。数字的“可追责”权力，与福柯笔下的规训权力在效果上高度相似。

但代理僭政与治理术的关键分离点在于：篡位者不是权力，而是知识自己的代理物。治理术追问的核心问题是：权力如何通过知识来操作、来治理？代理僭政追问的核心问题则是：知识如何在自己内部被自己的工具篡了位？这两个问题当然有交叉——权力常常利用代理物来进行治理——但它们的焦点不同。治理术的主角仍然是权力，知识是权力的工具；代理僭政的主角是代理物本身，它可以在没有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的情况下，仅仅通过局部理性的聚合，就完成从工具到对象的跃迁。

更具体地说，福柯的治理术分析天然地要求一个或一组“治理者”——国家、教会、医学权威、政府机构——作为知识/权力策略的施动者。而代理僭政的分析恰恰展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完全没有中央策划者的情况下，数十万学生、数千名管理者、数百家媒体各自在自己的局部处境下做出的“合理”选择，能够自发地汇聚成一个使代理物篡位的集体动态。US News排名的案例就清晰地展示了这一点：排名机构并没有统治高等教育的意图（它最初的动机只是卖杂志）；大学管理者并非在被动地执行某个上级机构的指令（他们是在主动地

利用排名来竞争资源)；学生和家长也不是被规训的被动主体（他们是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理性地使用排名信号）。没有治理者，只有无数行动者在同一个已经代理化的认知环境里做出的局部最优选择。但正是这些选择的宏观聚合，产生了一个治理术概念难以完全捕捉的效应：认知对象本身——教育——在制度认知中退场了，取而代之的是它的代理符号。

（三）与工具理性的分离：不是手段压倒目的，而是手段重构目的

工具理性批判——从韦伯对“铁笼”的忧思，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理性的辩证批判——是代理僭政与之关系最紧张的概念。工具理性批判的核心命题是：当手段的效率成为合法性的唯一来源，目的就被掏空了；手段吞噬了目的，人成了自己制造的工具的奴隶。

代理僭政与工具理性论述的共享地带相当宽阔。大学排名无疑是一套高度工具理性的装置：它用一系列可计算的指标来代理复杂的教育质量判断，使决策者能够在不深入理解教育过程的情况下做出“高效”的选择。排名指标越是“有效”（即越能预测申请人数、越能简化问责流程），它们在制度中的位置就越稳固。在这个意义上，代理僭政的一部分动力确实来自工具理性对效率的追求。

但代理僭政的核心机制不是“手段因高效而压倒目的”，而是一个工具理性无法完全捕捉的额外步骤：代理物对目的本身的重构。在标准的工具理性叙事中，手段和目的仍然是可分辨的两个东西：我有一个目的（例如，办好一所大学），我选择了一个高效的手段（提升排名分数），久而久之，这个手段变得如此高效、如此省心，以至于我忘了最初的目的，专注于优化手段。这是一个手段侵蚀目的、最终替代目的的故事。

但代理僭政的独特主张是：即使手段与目的在高度统一、高度合理的情况下，僭政仍然可能发生——而且恰恰可能发生得更隐蔽。不是“排名取代了办好大学”，而是“什么叫办好大学”——这个目的本身的定义——被排名重新书写了。一个具体的案例可以将这个区分坐实。

不妨设想一所研究型大学决定裁撤其一门具有数十年历史的古典语言专业。这个决定在工具理性的框架下会如何被解释？工具理性会说：大学有一个目的（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学术声誉），古典语言专业成本高、招生少、引用率低，裁撤它是高效地服务于这个目的的手段。这是一个手段压倒（另一种可能的）目的的故事。但代理僭政的关注点不同。它不否认这个决策是“理性的”，而是追问：在这个决策中，“什么叫好的学术”“什么叫有价值的学科”这个目的本身，是在什么条件下、通过什么代理物被定义的？当“引用率高的学科”=“好的学科”这个等号在资源配置会议中被当作不言自明的前提接受时，代理物（引用率）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服务于“学术卓越”这个目的的手段，而是成为了“学术卓越”本身的操作性定义。裁撤古典语言专业的决策者并不是“忘了”学术卓越这个目的，而恰恰是忠实地、高效地服务于他们已经通过代理物重新定义过的“学术卓越”。这就是代理僭政超越工具理性的地方：不是手段忘了目的，而是手段重构了目的，以至于最“理性”的决策，恰恰是最彻底地服务于代理物的决策。

因此，代理僭政提出了一个工具理性难以做出的判断：僭政可以发生在工具理性的“胜利”之后、或完全在它的监控之外。甚至在手段与目的关系高度合理、高度透明的条件下，代理物仍然可能篡位——因为它篡的不是手段-目的的逻辑链条，而是“目的”这个词所指的那个经验世界的可辨识轮廓。工具理性批判能够诊断“疯狂的手段”，却难以捕捉“温顺地重新定义了目的的代理物”。后者正是代理僭政所占据的那个辨别面。

（四）与量化修辞及指标反应性研究的对话：从行为层到存在论层的跃迁

代理僭政不仅需要与经典哲学社会学概念对话，还需要与当代科学社会学和组织研究中一条高度相关的实证研究线索直接对勘。波特（Theodore Porter）在《数字的信任》中论证了量化在公共生活中获得权威的机制：数字的合法性并非来自其技术精确性，而是来自其“机械客观性”的修辞力量——它让决策看起来独立于判断者个人的裁量权力（Porter, 1995）。埃斯佩兰与索德（Wendy Espeland & Michael Sauder）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法学院排名的深入田野研究，则提出了“指标反应性”概念：当人们开始对指标做出反应时，指标从测量工具变成了“被测量的东西”，并通过自我实现的预言重塑组织行为（Espeland & Sauder, 2007, 2016）。

代理僭政与这些研究共享着对量化指标“去自然化”的分析冲动，也大量受益于它们在经验层面对排名如何影响大学行为的精细展示。代理僭政的分析，尤其是在数字物化装置部分对FWCI的解剖，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不承认这一点，不仅是学术规范上的疏失，也会削弱代理僭政自己的经验根基——因为这些研究恰恰提供了代理僭政所需要的大量制度细节。

但代理僭政在何处超出了“反应性”的描述？反应性研究解释了行动者的行为如何被指标改变：法学院为了提升排名，投入更多资源在LSAT成绩和就业率上；大学为了优化生师比，设置更小的班级规模。这些都是行为层面的调整——行动者仍然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是在“玩游戏”——尽管这个游戏久而久之可能变得如此自然，以至于他们忘了自己在玩游戏。但代理僭政要解释的是一步更深的变化：认知对象本身被代理物篡位。不是“法学院为了排名而调整行为”，而是“当法学院的教授、院长、学生、校友开始通过排名来理解‘什么是好的法学教育’时，他们认知中所指向的那个对象——法学教育——已经不再是那些发生在图书馆、法律诊所、课堂辩论中的具体实践，而是法学院的排名位置”。这是从行为层到存在论层的跃迁：不是“人们因为指标而改变了做事方式”（反应性捕捉到了这一点），而是“人们因为指标而改变了他们以为自己在做的事是什么”（反应性无法完全捕捉这一点，因为它主要是一个行为概念）。

埃斯佩兰和索德确实观察到了法学院在“玩游戏”过程中出现的认知变化——例如，院长们在访谈中表达的一种无力感：即使他们个

人认为排名不反映真实质量，他们也无法不严肃对待它。但这种认知变化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主要被描述为“去耦合”和“再耦合”的组织策略——即组织如何在正式结构与实际活动之间建立松散的联系。代理僭政将这个现象推向了更深的层次：不仅是组织策略在变化，而且是整个认知体制中“什么叫教育质量”这个问题本身的指向物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一个需要通过复杂的、多重的、常常相互矛盾的经验材料来不断重新回答的问题，而是一个可以在表格中查到的答案。从“反应性”到“代理僭政”，跃迁的是问题的层次：从“指标如何改变行为”，到“代理物如何篡夺认知对象的位置”。

（五）四条分离线的综合

代理僭政的不可还原性，最终凝结为四条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分离线：与拟像分离于“真实持续存在且持续施压”（不是原件的死亡，而是原件的被篡位）；与治理术分离于“篡位者不是权力而是认知自己的工具”（没有中央治理者，只有局部理性聚合的宏观僭政效应）；与工具理性分离于“僭政发生在手段重构目的之时，而非手段压倒目的之时”；与指标反应性分离于“从行为层到存在论层的跃迁”（不是行为被指标改变，而是认知对象被代理物替换）。这四条线各自从一个侧面切出了代理僭政所占据的那个辨别面。它们不宣称代理僭政是一个与所有经典理论完全断裂的“全新发现”——那样宣称既是傲慢的，也是不诚实的。它们只是证明：在每一场与强劲对话者的遭遇中，代理僭政都有对方无法完全吸纳的剩余物。而正是这些剩余物，构成了这个概念得以成立的认知理由。

五、关键反驳与理论边界

一个分析概念如果不能明确想象最有力的反驳在何处，它就还没有完成自己的理论建构。本节将直面代理僭政可能遭遇的经典反驳，并以此进一步抛光本文核心判断的边界。

反驳一：没有僭政，只有代理人问题。 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早已分析了代理人与委托人利益不一致时，代理人可能追求自身利益而牺牲委托人目标的现象。排名的种种扭曲，不过是高校（代理人）在面对政府和社会（委托人）时，利用信息优势优化代理指标（排名）而忽略了真正的委托目标（教育质量）。这不是什么“代理僭政”，而是经典的激励设计失灵；对策很简单：设计更好的指标来对齐代理人激励与委托人目标。

这一反驳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但它恰恰落入了本文在道理装置部分已经分析过的“翻译”机制。委托-代理框架预设：存在一个明确的、可被定义且可被代理的“委托人目标”（教育质量），代理人的错误在于偏离了这一目标。代理僭政的主张则是：在排名体制的长期运作下，“委托人目标”本身的定义已经被代理物重新书写了。政府和社会作为委托方，并不先于排名就知道“教育质量”是什么——他们恰恰是在排名的持续流通中，学会了将“教育质量”等同于“排名位置高”。当加州大学系统将毕业率纳入对校区的考核框架时，它是在通过毕生生数据来定义自己作为委托方眼中的“好大学”。代理僭政的运动方向，不是代理人背离了给定目标，而是代理物向上游重新定义了目标——这是委托-代理模型没有预设的一个可能性。因此，设计“更好的指标”不会解决僭政，只会更换篡位者：用更“进步”、更“全面”的新代理物，替换旧的代理物，但代理物作为认知对象的位置不变。

反驳二：比较不等于排名，僭政的锅不该让比较来背。 比较本身是一种基本的认知操作——不经过比较，人类无法辨识差异、做出判断。如果本文批评的是排名，那就不该把矛头对准“比较”本身；将“比较”说成是“戴上王冠”，是在用一个有罪的部分（排名）株连一个无辜的认知功能（比较）。

这一反驳触及了本文的一个核心区分：代理僭政并没有把所有的比较都视为僭政。论文批评的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动态：在代理僭政的制度生态中，一种特定的比较——通过代理物的横向比较——被抬升到了压倒一切其他认知操作的优先地位，以至于不经过这种比较的判断被视为不可靠的、不可公开辩护的。这不是在说“比较本身有罪”，而是在追问：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比较被推上了认知王座，使得沉浸式的理解、纵向的深度叙事、个案的内在阐释全都退居为“主观的补充”？代理僭政分析的不是比较这个认知动作，而是比较在特定认知体制中被赋予的超常权威——而这超常权威，恰恰是由代理物的可携带性与可排名性为其铺就的。

反驳三：反身性问题——本文的分析也使用代理物来诊断代理僭政。 如果所有语言都是某种代理（范畴是对个别的代理，概念是对经验的代理），那么本文对代理僭政的批判，如何避免自己也踩进同样的泥淖？“代理僭政”这个概念本身，难道不也是一个代理物吗？它会不会也在某种条件下，篡夺了它所试图揭示的那个“真实的认知体制”？

这个反驳点到了代理僭政命题的反身性张力，这是本文不回避、也不应回避的。本文的回应分两步。第一步是诚实地承认：是的，“代理僭政”也是一个概念代理——它不可能跳出语言本身即代理这一认知条件。它不是在代理之外建立了一个非代理的纯净观察点。第二步则是区分代理的两种用法：工具性代理与封闭回路代理。工具性代理承认自己是临时的、可修正的、服务于对象的，它的使用者知道自己可以不依赖它而存在。本文对“代理僭政”这一概念的使用，正是此种：它被锻造出来，服务于一个特定的分析任务（揭示三重装置联动的发生动态）；它与经验材料之间保持摩擦（在US News案例的追踪中反复校准）；它承认自己可以被更好的分析框架替代——这正是本文的证伪策略所要确保的可裁决性。而封闭回路代理恰恰相反：它将自己确立为理解对象的唯一通道，排斥任何不经过它的认知接触，并吸收一切批评为自身的优化燃料。代理僭政这个分析概念是否滑向了后者，取决于论者是否持续地将其与经验材料之间的摩擦制度化地公开——而不是用这个概念作为终止追问的结论语。本文正是通过将自身的证伪条件明确写出，来完成这一反身性的自我约束。

结论：在代理矩阵内部维持生产性张力

代理僭政告诉我们，比较的霸权不是任何人策划的阴谋，而是一个由历史土壤接生、由三重装置联动驱动、由无数局部合理决策合谋喂养的自我增强过程。我们越是试图用更好的排名来修正排名的缺陷，越是为此这个动态输送燃料。从这个生成机制分析中浮现的伦理任务，因此不是一个“打破代理”的解放计划——那本身仍然以某个未经代理的纯粹感知为隐含的目标，是既成事实的典型姿势。伦理任务应当是：在代理已经高度制度化的既成事实之下，如何持续维持代理与真实之间一道不可消除的生产性张力，让代理物始终感知到来自认知对象的反压，始终处于可以被重新打开的不稳定性之中？

这首先意味着，在制度设计上争取那些有意“低效率”的认知空间。在研究生讨论课上不设可量化的课程目标，使教育价值无法被预先提取为指标；在学术评价中保留实质性的同行评议，让判断重新嵌入具体的学科共同体内部，而非外包给引用数据的机械算法；在大学战略规划中设置不对外公开、不纳入考核的内部实验区，让长周期的基础研究免受年度产出指标的审视。这些实践没有一个是“完美的解决方案”，因为代理僭政本身不是一个可以被一次性“解决”的问题。但它是一种始终必需的拖拽力——是代理与真实之间那根不能松开的弦。代理的存在不可避免；但代理的篡位可以被持续延迟。而每一次成功的延迟，都为那些无法被代理的认知经验保存了一个能继续发生的制度条件。

当然，这里存在一种合理的质疑：这种张力维持的主张，是否听起来很体面却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当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从政府拨款公式到博士生招生名额——都被捆绑在排名和量化指标上时，提倡“在制度内维持认知自治空间”是否只是一种智识上的安慰？这一质疑是对的，它指出了本文无法回避的一个边界。认真的回应需要另一篇文章的篇幅：去考察那些在高压代理生态中确实成功地维持了认知自主的小型制度实验——某些文理学院坚持不参与排名、却通过独特的价值叙事维持了招生竞争力；某些研究机构以长周期评估替代年度产出考核，并相应承担了短期可见度下降的成本。本文的目标是诊断代理僭政的发生机制与自我增强动态，而不是制订改革路线图。但生成机制诊断的价值正在于此：它让那些反复出现的“无法逃脱”的感觉不再被误认为只是个人的无力，而是被识别为一个有其特定生成条件的制度动态。认识到代理僭政是一个动态、不是一个命运——每一次合法的公开质疑都松动它一点，每一次联合抵制都逼它打一个补丁，而补丁多了，缝隙就会大一些——本身就已是一种认知解放。真正的“出路”不可能来自一篇论文，而只能来自那些带着这一诊断回到各自制度现场的实践者，在他们所处的局部环境中，用最具体的判断去撬开那个最小的松动空间。

从代理僭政的生成机制分析出发，最终要抵达的不是对数字的厌恶，也不是对前现代认知方式的乡愁，而是一种清醒的、战术性的认知伦理：知道你眼前那张表上的每一个数字都曾经从某个具体的、充满矛盾的、不可替代的认知经验中被蒸馏出来，知道你每一次对这些数字的引用都在喂养着那个使真实退隐的增强回路，同时也知道——你今天在某次会议上质疑的那个指标，可能正是这台机器下一次被迫打上补丁的地方。代理僭政的最终抵抗力，不在于它是一堵无缝的铁墙，而在于它让太多行动者以为，铁墙后面什么也没有。

注释

[1] DiMaggio, Paul J., and Walter W. Powe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no. 2 (1983): 147–60. 本文援引此研究，取其关于组织在面临不确定性时倾向于模仿同行以获得合法性的分析，而非原出处中关于“标签”扩散的具体论述。

[2] 这类叙事的一个代表性样本可见《哈佛商业评论》和《纽约时报》教育专栏中反复出现的“决策科学向演化心理学取经”类论述。因其主要以媒体评论而非学术研究形态流通，本文仅将其作为“道理装置”的一种话语类型分析，不视其为严格的学术论证。

[3] 这一论证传统可追溯至Akerlof (1970) 关于信息不对称市场的经典论文，其后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应用见之于诸多教育经济学教材和排名政策白皮书。

[4] 关于英国RAE/REF评估改革中“影响力”指标的引入及其对人文学科的收编性影响，见Watermeyer, Richard. *Competitive Accountability in Academic Life: The Struggle for Social Impact and Public Legitimac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9, 特别是第4至第6章；以及Collini, Stefan. *What Are Universities For?* London: Penguin, 2012 中对“影响议程”的批判性分析。

[5] 作者在此处描述的是对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美国主流纸媒报道中排名话语变化的大体观察，具体文本比较有待系统的媒体话语内容分析来验证此趋势。

[6] 关于2019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对US News排名方法论的早期公开批评，参见Jaschik, Scott. “Is the U.S. News Rankings Game Over?” *Inside Higher Ed*, September 9, 2019.

[7] Thaddeus, Michael.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Facts Behind Columbia’s U.S. News Ranking.” 个人发布分析报告，2022年2月。该报告引发广泛媒体报道，包括Hartocollis, Anemona. “Columbia Loses Its No. 2 Ranking in U.S. News’s List of Best Colleges.”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2, 2022.

[8] 哈佛法学院院长John F. Manning关于退出US News排名的公开声明，发布日期为2022年11月16日，全文发布于哈佛法学院官方

网站。耶鲁法学院院长Heather K. Gerken同日发布类似声明。两校的联合行动被视为本轮抵制潮的引爆点。

[9] 2024年前后，部分曾宣布退出的法学院在US News修改方法后恢复了数据合作，参见Sloan, Karen. “Law Schools Quietly Return to U.S. News Rankings as Revolt Fades.” Reuters, March 26, 2024.

深化增补：被放跑的最近邻、操作化与证伪

以下四节为编辑增补，与作者正文分开标注。

增补一：与古德哈特定律、埃斯佩兰-绍德“反应性”、波特《对数字的信任》的硬边界

正文与拟像、治理术、工具理性、量化修辞学做了勘界，却绕开了三个正对着本文靶心的对手，这是本文最大的失分处。古德哈特定律指出一项测度一旦成为目标就不再是好的测度；埃斯佩兰与绍德的反应性研究以美国法学院排名为案例，详细记录了排名如何改变被排名者的行为并进而改变排名本身；波特则论证对数字的信任是一种在专业权威薄弱处生长出来的替代性信任机制。三者合起来几乎覆盖了本文的全部经验描述，且第二项与本文使用同一类案例。分野必须在机制而非现象上给出。三家所论的都是行为层：被测量者改变行为以迎合指标，测量因此失真——其中认知对象始终在场，各方都还知道排名不等于教育质量，只是行动上不得不迎合。本文主张的是认知层的位置替换：追问“什么是好的教育”这件事本身不再向教育实践敞开，而向指标闭合，以至于提问者已经想不出在指标之外该看什么。可判别面：若被排名者在脱离考核压力的场合仍能自发地用非指标语言描述教育质量，则替换只发生在行为层，三家足以解释；本文预测存在一类现场，即便在无任何利害的场合，参与者对何为好教育的自发描述也已完全由指标词汇构成。这个检验本文尚未做，应作为首要的经验任务列出。

增补二：三重装置的可测形式

命名、道理、数字三重装置若无测量方案，本文与上述三家的分野就无法被经验裁决。建议：命名装置，测量代理物的名称在公共文本中被当作实体主语使用的频次——排名上升与学校变好被当作同一件事陈述的比例；道理装置，测量论证代理与真实之间等同关系的文本量，及其中援引经验证据与援引权威的比例；数字装置，测量代理物被携带跨场景使用的次数，即它在与原初评估目的无关的决策中被援引的频次。三项之外须单列一项关键指标：非指标描述能力，即在无利害场合中，参与者描述质量时使用非指标词汇的比例——这一项直接对应增补一提出的判别面，是本文相对于反应性研究的全部经验负担所在。

增补三：抵抗方案的收紧

正文提出抵抗任务不是在代理矩阵之外寻找纯粹感知，而是维持代理与真实之间的生产性张力，这一表述在方向上正确，但作为方案过于空泛，且与本文自身的诊断存在张力：若代理已完成位置篡夺，那么谁来维持张力、凭什么标准判断张力是否还在？可收紧为两条可操作要求。其一，制度上必须保留至少一个不产出任何可携带数字的评估通道，且该通道的结论不得被折算进任何排名——不可携带性是关键，因为本文的数字装置正是靠可携带性完成篡位。其二，代理物的每一次跨场景使用都须留下与原初评估目的的距离说明，使越界可被追溯。两条都不要求纯粹感知，只要求可追溯性。

增补四：与已发表《比较的假肢》的分野

作者已发表的《比较的假肢》与本篇同以量化评价为对象，须切开，否则两篇会被读成同一诊断的两个尺度。那一篇的分析单位是个体的认知回路：假肢替代的是比较的发动——察觉不对并自行命名方向的启动动作，受损者是使用者本人，且他感认为自己还在比较。本篇的分析单位是集体的认知体制：代理物篡夺的是认知对象的位置，受损的是共同体追问的可能方向。两者可以脱钩：一个代理僭政尚未完成的领域里，个体仍可能被假肢化；一个高度僭政的领域里，也可能残存少数发动回路完好的个体——正文关于抵抗的讨论正应落在这类个体身上。两篇宜互相标注，并共同追问：个体回路的假肢化与体制的僭政，何者先行。

编辑增补所依据的核验文献

Charles A. E. Goodhart, Monetary Relationships: A View from Threadneedle Street, University of Warwick, 1975.

Wendy Nelson Espeland & Michael Sauder, Rankings and Reactivity: How Public Measures Recreate Social World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3(1), 2007.

Theodore M. Porter, *Trust in Numbers: The Pursuit of Objectivity in Science and Public Lif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es et simulation*, Galilée, 1981.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Gallimard/Seuil, 2004.